

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实践逻辑与效能优化*

——基于鲁中典型村的历时性探讨

管 珊

摘要：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党建何以引领、以何引领及其效能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研究。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淄博市乐疃村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发现：嵌入村庄治理过程的适应性党建形塑了村级党建与村庄治理的正向循环，促进了村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和引领力塑造，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村级党建通过“资源—主体—行动”的三维引领，以资源链接机制、主体整合机制和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现了发展项目落地和初步运营；这一发展过程逐渐形塑出“政社共建、有限共治、延迟共享”的治理格局，带来了后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停滞，从而折射出党建引领的实践张力。乐疃村的案例展现了党建引领在促进国家与社会互补共进上的实践复杂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种创新性探索，需要基层党组织在权威、利益、价值层面耦合调适，以此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秩序，提升党建引领效能。

关键词：党建引领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国家与社会 治理效能 共建共治共享

中图分类号：F321.32; D267.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以党支部下乡推动农业集体化、建立人民公社，并配合统购统销的实行，建立了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徐勇，2007；李术峰，2019）。这一体制曾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李怀印，2019）。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被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替代，形成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编号：21CKS042）的阶段性成果。

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领导村民自治等是基层党支部的重要职责。随着集体负债的增加和农民负担的加重，国家在 21 世纪初取消了农业税，国家、集体和个体间的利益关系得以调整（王习明，2005）。然而，随之而来的集体“空壳化”问题与基层党组织弱化问题，让乡村社会呈现原子化、去组织化趋势（彭海红，2014）。乡村共同体解体，乡村社会中个体与国家的对接和与市场的对接面临诸多困难（张慧鹏，2017；贺雪峰，2019）。面对集体经济弱化带来的乡村发展问题，集体经济的再出发就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要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①。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使命，也成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抓手。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围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第一，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讨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研究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物质基础（霍军亮和吴春梅，2018）。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将党建与具体业务有机结合，改变党建悬浮化状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胡柳娟，2018；徐丙祥，2018）。在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将下派第一书记与发展集体经济、改变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局面相结合，可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引领功能（汪俊玲，2018）。采取依托合作社建支部、开展联村党建等方式，围绕产业重新构造党组织设置模式，可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资源共享力（朱哲和姜广博，2020）。第二，讨论基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现了以集体经济发展激活基层党建，助推村社再组织化的目标（陈义媛，2020）；这一发展模式以“虚拟确权”和“三权”分置实现了经营权向集体的回归，促进了农民财产权与集体统筹的平衡，进而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撑（叶娟丽和曾红，2022）；发展过程中村集体与村民紧密利益联结的建立，可促使乡村公共服务与治理秩序逐步优化（马良灿和李净净，2022）。

上述研究虽然充分肯定了基层党建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联以及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但关于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仍然是比较匮乏的。一方面，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地的共识；另一方面，党建何以引领、以何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机理却并不清晰。此外，现有研究多采用静态研究方法，缺乏历时性分析和动态过程研究，对党建引领的张力缺乏揭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家与社会互动下党建引领的真实图景。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山东省淄博市乐疃村的历时性分析，系统揭示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及效能优化的可能路径。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研究进路

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能够在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的

^①习近平，20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261页。

中国需要探索党、国家与社会共生共强的领导体制（林尚立，2001），实现由“政党组织社会”向“政党引领社会”的转变（田先红，2020），以此促进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国家建设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祝灵君，2016）。党建引领也是通过党组织的建设，寻找党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作用的关键点（王长江，2019），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上，现有研究存在国家导向到社会导向再到国家与社会耦合导向的转变。国家导向的研究凸显国家自主性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强调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发生统合作用（谢忠文，2015）。党建引领的具体策略是以嵌入、吸纳等方式实现资源的聚合和对个体或组织的动员（程熙和杨鸣宇，2014）。然而，这一路径容易带来行政化与悬浮化弊端。社会导向的研究则认为，政党首先来自社会，党建引领的重心在于整合社会、重新激活社会（王浦劬和汤彬，2020）。既然党组织无法在基层社会中完全依托行政权力实现有效的动员与控制，党组织就有从“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角色转变的需要（郑琦，2016），努力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使基层党组织从管控型的组织领导向服务型功能转型（刘红凇，2015）。但是，社会导向的党建引领路径在实践中面临服务泛化、治理权威式微的困境（吴欢欢和吕德文，2023）。在国家与社会耦合导向下，党建引领的实现是基层党组织在治理实践中充分发挥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充分耦合的结果。党建引领成为促进国家与社会互补共进的重要“第三领域”（黄宗智，2019），有必要在“国家—社会”关系考察中把政党带回来（景跃进，2019）。党建引领的实现机制有统合型经纪（原超和马华，2023）、助推式耦合（石东伟和肖立辉，2023）、嵌入式整合（袁方成和杨灿，2019）等。在新发展阶段，党建引领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耦合，即要求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实现党对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整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①。治理共同体一方面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即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另一方面也凸显“共同体”的意涵，即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并非基于分工形成的机械整合，而是基于协商达成的有机整合，是一种责任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毛一敬和刘建平，2021）。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也是发挥党对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整合作用的过程，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党建引领效能，即提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效能。依循党建引领的理论转向，本文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耦合的视野下展开分析。党建引领下国家与社会的互补共进实际上指向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党建引领的过程，从构建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出发来审视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有助于理解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与张力，展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

（二）基于发展历程的分析框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基本前提，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劳动者可以进行劳动、

^①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4页。

资本、土地等各生产要素联合，并以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方式进行分配的经济形式（周立等，2021）。在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得不足而“分”得有余的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富有勇气的探索。部分村庄在党建引领和集体经济已有积累的基础上主动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充分呼应了时代需求，但也呈现了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基于山东省淄博市乐疃村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整个历程，本文构建“动力系统—运行机制—治理效能反馈—效能优化”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系统回答党建何以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动力系统）、以何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运行机制）、引领效果如何（治理效能反馈）及效能优化的可行路径问题。在村庄治理场域中，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表现为党建引领与村庄治理效能的统一。良好的村庄治理效能既是嵌入村庄治理的党建引领的结果，也构成了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党建引领的过程。村级党建以一定的机制推动集体经济增收，进而重构了村庄治理场域，形塑党建引领的效能反馈。从村庄治理的角度而不是集体经济增收的角度探讨党建引领问题，能更加全面地呈现国家与社会互补共进视角下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逻辑与张力，为进一步优化党建引领效能奠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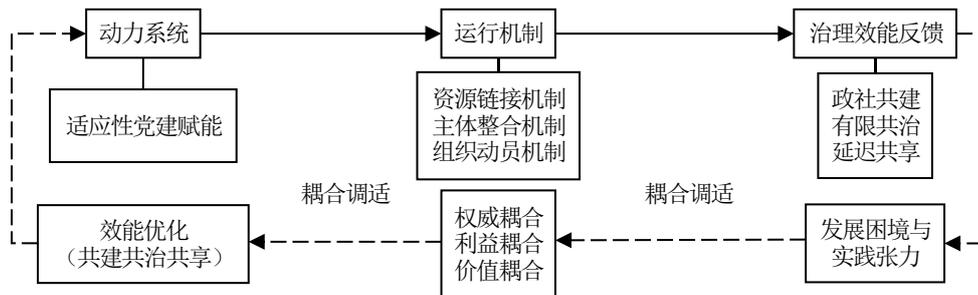


图1 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与案例介绍

（一）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法。在寻求对既有现象的解释（例如，一些社会现象如何形成、如何运行等）时选择案例研究法是贴切的（殷，2017）。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宜放置在村庄治理场域中理解，将村庄作为分析单位是合适的。本文通过考察村庄治理场域中村级党建与集体经济发展的复杂互动关系，探讨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运行机制和治理效能反馈，进而把握国家与社会互补共进视角下党建引领的实践逻辑与张力，为进一步优化党建引领效能提供经验支撑。山东省淄博市乐疃村个案的典型性在于：一是乐疃村不是集体经济“空壳村”，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发展一直是村庄治理的重心，高度呈现了党建引领与集体经济同频共振的发展过程；二是乐疃村以文旅产业为支撑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建立在集体经济积累和滚雪球式增长基础上的，是内生式发展探索，与国家资源单向输入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相比，更凸显了社会的能动性，适合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考察党建引领的实践逻辑；三是作为2014年开始探索村集体文旅产业发展的村庄，乐疃村已呈现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对其发展过程的反思总结可以与其他案例进行经验对照，

有助于形成对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更加全面的理解。个案研究尽管不排除个案本身的特殊性，但对于理解新兴社会现象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非常关键，构成了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乐疃村的案例为理解当下亮点村及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解读。

2.资料来源。本文案例研究的素材首先来自2016年9月笔者及研究团队其他成员对乐疃村开展的为期20天的田野调查，包括对乡村两级干部、村民和合作社管理人员的访谈资料^①；其次来自2018年12月研究团队再访乐疃村获得的观察和访谈资料，观察获得的资料主要记录了乐疃村当时的冷清景象，与上次调研时的红火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访谈资料则主要是针对原村书记和部分村民的访谈；最后来自2023年3月研究团队对乐疃村原村书记、文旅产业合作社经理、驻村干部的电话访谈与微信访谈资料。除了上述一手资料外，研究团队持续关注的乡镇政府工作动态和由乐疃村公开报道整理而来的网络信息资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支撑。

（二）案例介绍

山东省淄博市乐疃村位于博山区城区西南3千米处，县域工业基础好，村民多在县城就业，以离土不离乡、早出晚归的方式生活在村庄。乐疃村现有人口2000多人，耕地600余亩，山林3000亩。村办企业改制后，乐疃村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集体“三资”梳理与村庄建设阶段，取得了良好的村庄治理成效，村级党建也被激活，形成了村庄治理与村级党建的良性循环；二是集体投资与文旅产业发展阶段，充分发挥了党建引领的势能，促进文旅产业一期和二期项目落地运营；三是村企分离与村庄维持性发展阶段，村庄去公共化与村级党建悬浮化同时彰显。

1.集体“三资”梳理与村庄建设阶段。乐疃村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村办企业的辉煌时期，此后村办企业改制，村集体资产部分流失，集体“三资”管理逐渐走向混乱，并欠下200余万元的集体债务。2002年能人孙某被村民选为村主任，自此乐疃村开始全面清理集体债权债务，理顺企业与村集体的承包合同关系，严格按合同办事，采取法律手段解决少量企业不履行合同义务的问题，坚决保障集体收益，受到村民高度拥护。还清集体债务后，乐疃村尚可通过厂房出租每年获得10多万元集体收入，这成为村级组织的重要治理资源。村集体向村内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30元不等的福利，为征兵考学之人发放红包等，促进了社会凝聚，为接下来的新农村建设打下了基础。

2007年孙某开始担任乐疃村村书记后，十分重视村级党建工作，并使之与村庄治理工作相结合。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乐疃村抓住机遇推动了旧村改造和集中居住工程，通过将分散居住的农户集中搬迁上楼，集中供暖，配套文体广场、文化大院、社区门诊、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促进了村民生活方式现代化，提升了村民生活幸福指数，也为村庄留住了人。此外，村集体还统一规划建设了公墓陵园，改变了过去村民私自占用集体山林建设墓地对外出售的局面^②，形成了集体统一市场化运营。这一方面可维系村庄安葬秩序和尊老传统，另一方面也为村集体创收几百万元，奠定了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坚实基础。村庄建设不仅改善了村庄面貌，便利了村民生活，提供了安养环境，也吸引了

^①本文案例涉及的所有人名均系化名。

^②该村有个名人墓，被当地人认为风水好，一些村民便占用集体山林建设墓地，很多人来此购买。

城市退养老年人来此居住生活。在发展建设过程中，为便于村庄治理，乐瞳村成立党总支，下设企业党支部、退休工人党支部和农民党支部3个党支部，农民党支部再按农户居住片区下设8个党小组。乐瞳村以党组织覆盖面扩张将不同职业的村民党员组织起来，以正规化党组织生活激活党员身份意识，以本村工作的需要鼓励党员带头进而影响群众。这一阶段的村庄建设既做好了民生工作，凝聚了人心，也增加了集体收入，激活和锻炼了村级党组织，促进了村级党建与村庄治理的良性循环。

2.集体投资与文旅产业发展阶段。2013年底村“两委”换届，孙某仍然高票当选村主任和村书记。在这一届任上，村级党组织的群众基础、集体资金的积累都达到一个高峰。2014年，乐瞳村结合村庄内闲置农房资源和区域乡村旅游规划，开始发展凸显特色民俗品牌的乡村旅游。乐瞳村采取了“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集体开发经营模式，依靠集体积累、国家项目资源、银行贷款等实现前期民宿、餐饮和民俗景观的投资建设。一期开发涉及12户农户的农房改造，其中7座农房开发成了农家院落，5座农房拆掉建设了停车场。二期开发将村废旧小学改造成了商务宾馆和怀旧主题教室。2016年，乡村旅游一期项目（农家院落改造与餐饮）和二期项目（商务宾馆、乡愁景观、采摘园等）建成运营，共可容纳70多人住宿。2016年当年旅游收入已达100万元。乐瞳村文旅产业高度嵌入村民生产生活空间，农家院落和商务宾馆的景观建设也是村庄环境的一部分，对所有村民开放。石碾磨坊不仅是游客体验农家文化的场所，也是村民日常生活设施的一部分。每年9月，乐瞳村举办的文化节既为游客体验地方特色文化提供了机会，也成为评选“最美乐瞳人”的平台，而且是村庄广场舞队及有业余爱好的村民展示才艺的舞台。项目落地充分动员了村干部参与农房改造，以农房折价入股合作社，项目建设和公共文化设施则充分动员了党员，以党员示范带动了群众参与。在这一过程中，乐瞳村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国家级“美丽乡村”、中国“双优古村”等荣誉称号。

3.村企分离与村庄维持性发展阶段。2017年底村“两委”换届，孙某在诸多项目筹建推进时意外落选村主任。新上任的村主任调整村庄发展思路，将文旅产业与乐瞳村集体经济剥离，将与文旅产业配套的公共设施一律关停，出售需要请人工维护的部分集体资产，不承认因文旅产业发展而产生的集体负债，也放弃集体投资日后应享有的权益。乐瞳村集体经济发展重回“地租经济”模式，即依赖前期的部分工业厂房出租出售和公墓出售收入。新一届村委会班子兑现竞选承诺，提高集体经济福利分配，将对本村老年人的福利补贴由每月30元提高到每月100元。然而，这一福利调整让乐瞳村集体经济捉襟见肘。村庄的公共文化服务及其他公共建设难以得到集体资源支持，村庄氛围日益冷清疏离，村庄人财物外流的步伐加快，不少村民都进城居住。在新的发展思路下，村级党建日益悬浮于村庄治理。2018年，孙某愤而辞去村书记一职，乡镇下派驻村书记管理，但村级党组织的向心力和村庄凝聚力均明显下降。2023年，当地旅游业迎来疫情之后的反弹，乐瞳村文旅产业开始逐步恢复生机，为日后村企关系调整奠定了基础。

四、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

通过对乐瞳村发展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级党建是同频共振的关系。下文将聚焦集体产业的建设和运营，探讨村级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运行机制和治

理效能反馈，将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置于村庄治理场域，透视村级党组织功能的生成和国家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彰显。

（一）动力系统：适应性党建赋能

1. 村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被激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村级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的必然要求。在集体“三资”梳理与村庄建设的过程中，村级党建成为村庄治理的突破口，形成了村庄治理对村级党建的正向反馈。这一过程不仅形塑了村庄公共性和村级党组织的公共性，而且激活了村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使其在领导村庄发展中能够发挥愿景引领力（杨润峰等，2023），兼顾长远发展和眼前发展，实现国家、集体与村民利益的统一。从村庄层面看，集体经济发展是立足村庄资源，积极发挥集体“统”的优势，促进村庄内部要素重新整合，谋划长远，促进集体经济增收和村庄治理增效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涉及当下村庄治理需求又关乎村庄未来命运。从国家层面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为村庄治理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还能提升村庄公共性，促进社会整合，提升国家资源下乡的效率，促进下乡资源与村庄发展需求相结合，实现国家、集体与村民利益的统一，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就是以村级党组织的政治性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再出发和可持续性发展。乐瞳村在拥有相对稳定集体收入和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发展文旅产业，正是考虑长远的选择，是为村庄留住更多人、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选择，彰显了村级党组织的政治使命和责任担当。

2. 村级党组织的引领力被塑造。引领力是指村级党组织凝聚共识、明确村庄发展目标，整合国家资源、集体资源和村民资源，有效组织动员村民，共同推动村庄发展的能力。村级党组织对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使其能够及时捕捉国家发展战略和村民发展诉求，适时调整集体经济发展方向，实现国家、集体与村民目标的统合。乐瞳村以重塑政经关系为起点，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推动集体“三资”梳理与村庄建设，不断满足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需求。乐瞳村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积极开展村级党建工作，发展年轻党员，在各种志愿活动和公共活动中锻炼党员，以党员带动群众，形成干事创业、团结奋进的村庄氛围。这一过程实现了集体经济的滚雪球式增长和村集体统筹服务能力的提升。村级党组织团结凝聚村民、服务村庄需求、引领村庄发展的能力被塑造出来，奠定了党建引领文旅产业发展的能力基础。

（二）运行机制：“资源—主体—行动”的三维引领

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不仅扎根乡村社会，而且直面村民村务，服务于乡村社会发展事宜。村级党组织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联结点。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正是发挥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的过程。

1. 资源链接机制。资源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村级党组织对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也决定了村级党组织可以有效链接国家资源与社会资源，促进国家资源落地和社会资源激活。一方面，村级党建以村级党组织本身的建设和村庄治理的整体改善，来有效链接国家项目资源。乐瞳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程显示，在村庄甩掉集体债务的历史包袱、有效管理集体资源、围绕民生需求谋发展的进程中，村级党组织也得以重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村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还成为县级先进村和县委书记驻点村，为国家项目资源输入和集体经济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

村级党建借助村内党员覆盖面广的信息优势，有效链接社会网络资源，在村庄招商引资过程中，发挥党员穿针引线的作用，有效链接外部市场资源。乐瞳村党总支下设企业党支部、退休工人党支部和农民党支部，管理有序、组织化程度高。加强村级党建既减少了村内工作开展的阻力，也能充分发挥不同党员的信息优势，助力村庄发展。退休工人党支部和企业党支部虽设在村庄，但这些党员在城市里、在市场上拥有广阔的社会网络资源，成为村庄发展集体经济、链接外部资源的重要媒介。例如，乐瞳村发展旅游休闲农业，投资创办火龙果、草莓采摘园的外部资本就是本村党员引荐过来的。

2.主体整合机制。乐瞳村文旅产业发展对内层面涉及对村民生产生活空间的改造，对外层面涉及对市场运营规律的把握，需要实现内外相关主体联动，以主体联动进一步推动要素整合。在主体整合上，一方面，乐瞳村通过强化村社集体治权，增进权责一致意识，实现对分化村民的整合。乐瞳村以集体山林资源为基础，统一开发、统一经营公墓，禁止村民以家族势力为依托对集体资源的霸占和攫取。集体资源的开发和集体收入的积累强化了集体治权，乐瞳村在诸多事务上建立了奖惩机制，形塑了村庄公共性，强化了村民在公共事务上的责任意识，有效化解了项目落地过程中因村民私人利益膨胀带来的困境，实现了对村民主体的整合。另一方面，乐瞳村以村级党建的组织嵌入，促进多元主体联动。因公共设施建设完善、居住环境好，乐瞳村不仅留住了人，还吸引了外流人口回村居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就是以“事”为载体实现对“人”的组织 and 动员以及以“人”为主体完成对“事”的治理（李永萍，2020）。为更好实现以“事”为中心的治理，乐瞳村党组织在企业主群体和退休工人群体中都设置有党支部，通过组织嵌入建立企业主、退休工人与村庄发展的制度性沟通渠道，在每年召开4次的全体党员大会和其他日常党组织活动中，实现多元主体间的信息交流。这一组织嵌入和主体整合能为文旅产业的运营思路拓展、服务项目创新等提供助力。

3.组织动员机制。村级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在村庄内部开展广泛的组织动员。这一动员既有来自政党组织的权威动员也有来自日常互动的示范动员。在政党组织的权威动员方面，加强村级党组织班子建设是核心。村级党组织要动员群众，先要具备一定的威望，而这个威望必须通过维护村庄公平正义来实现。乐瞳村充分发挥党员、村民代表作用，以“四议两公开”作为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基本程序，此外也通过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原则坚守和公平公正促进实质正义。乐瞳村通过村庄治理的实践塑造村级党组织领导权威，有效凝聚群众，进而在具体事务中有效动员群众。例如，文旅产业发展涉及对农户农房的拆迁，农房评估价格是村民核心利益所在，村“两委”班子的权威让村民相信评估是公平公正的，因而村民能够被动员起来配合评估工作和后续工作的开展。日常互动中的示范动员则通过年轻党员培养和党员身份显化等一系列举措促进村民参与公共事务。2007—2016年，乐瞳村共发展了21名党员，摆脱了党员队伍老龄化的不利局面。年轻党员拥有干事创业的激情，也具有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行动能力。例如，乐瞳村文化节举办时，年轻党员负责布置舞台、积极协调物资、看守场地等，这种生机与活力是可以感染其他党员和普通群众的。乐瞳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充分激活党员身份意识，内化党员责任义务和权力担当。例如，乐瞳村在党组织不断完善组织架构的基础上严格落实开会制度，正规化、制度化党组织生活，彰显党员在村庄发展中的重要性，形成党员担当作为的氛围等。乐瞳村在决定走文旅结合型产业发展道路时，孙书记就曾带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到

外地考察，统一认识；一些公益活动如清扫道路积雪、打扫环境卫生等，村干部也号召党员志愿参与。党员的思想 and 行动可进一步影响普通村民，扩大了乐瞳村文旅产业发展初期的群众基础。

（三）治理效能反馈：治理格局重塑

村级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有效的村庄治理对村级党建的激活，而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也重塑了村庄治理格局。文旅产业建设的高标准、高投入、高风险及股份合作所带来的村民参与分化，使乐瞳村在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塑出“政社共建、有限共治、延迟共享”的治理格局。虽然乐瞳村在发展过程中意图建立集体收入增长与村庄治理效能提升和村级党建加强的正反馈循环，但这一发展过程到后期实际带来了对村庄公共性和村级党组织公共性的消耗。

1.政社共建。乐瞳村文旅产业的初期建设依靠集体积累、国家项目资源、银行贷款、村干部支持共同实现，合作社运营又专门引入外来经理人，其发展是政社共建的结果。国家资源在文旅产业建设投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但国家资源下乡的同时，各部门的考核监督也随之下乡。因此，先进村在获得更多下乡资源的同时，也必定要接受更多的考核监督。严格而刚性的考核监督助长了基层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村级党组织在执行政策时的自主空间被压缩。例如，乐瞳村2017年在环境整治工作中需要按照上级指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两断三清”目标，造成纵使相关企业采取了污染处理措施但仍被要求关停。虽然当时的村书记孙某对此也不理解，但乐瞳村作为先进村被要求各项工作带头。利益受损的村内企业主因此对村党委心生怨气，并在后续村“两委”换届时采取恶意竞选等报复行为。此外，一些高标准的产业发展规划日益脱离村庄实际和村集体承受范畴。乐瞳村在发展文旅产业时积极筹划引入社会资本发展乡村康养；乡村民宿旅游本以城郊周末游为主，但在建设中逐渐朝打造中国乡村旅游胜地发展，因此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改造山林和水资源。然而，高规格的发展定位让村集体债务成倍增加，在村民参与有限的情况下，文旅产业发展很难得到村民认同，村集体代表成员集体意志的难度在增加。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张力凸显。由此，乐瞳村文旅产业发展虽然表现为政社共建，但村级党组织在执行政策上的自主性被压缩，在统合国家、集体与村民发展目标上的难度增加，平衡国家、集体与村民之间利益的难度也在加大。

2.有限共治。乐瞳村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体现在空间改造、环境整治等事项上获得村民的配合以及公共活动（如文化节）中村民的积极参与等方面。但在文旅产业市场化运营过程中，普通农户的参与是缺位的，而村干部则面临双重身份困境。文旅产业发展之初为动员农户参与，乐瞳村决定采取“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鼓励农户将农房入股合作社，今后享受产业分红收益。村集体是主要投资方，农户以农房入股，合作社成为集体经济的载体和有效实现形式。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既要体现村集体的投资权益进而面向全体集体成员分配收益，也要体现合作社股东权益以及合作社经营中的管理和劳动贡献，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但一期建设涉及农房改造的12户农户，只有3名村干部家的农房是入股合作社的，其余农户均以市场评估价将农房折价转让给合作社长期使用。按照机制设计，农户作为股东参与文旅产业发展，对合作社运营进行监督，合作社按照村集体股、农户股与管理股的贡献确定分配方案。但出于对股份制的不了解和对产业发展风险

的担忧，农户更倾向于接受农房一次性转让的方式，因而在产业发展中是参与缺位的。村干部则面临较强的政治动员，需要起到示范作用，吸引村民入股，为后续产业扩张做准备。此时，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场域中存在“公”与“私”的双重身份，一重是作为产业引领者和集体经济经营者的“公”的身份，另一重是作为合作社个人股东的“私”的身份。在“公”“私”身份叠加下，村干部要动员农户面临着诸多困难。此外，即便在合作社引入职业经理人来运营管理的情况下，村干部的双重身份使合作社依然面临“政经不分”的弊端，合作社难以自主决策，带动产业发展的角色不够凸显。

3.延迟共享。为提高产业发展速度，乐瞳村文旅产业的利益分配呈现延迟共享的局面。文旅产业发展面临巨大的投资压力，村级党组织通过政治动员，让村干部不仅以农房折价入股的形式参与农房改造，而且高强度调动村干部参与项目建设，并将合作社运营收入继续追加到投资建设中，并没有按照资产、管理贡献予以分配。村干部面临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不匹配的问题。村集体作为文旅产业的主要投资方，将合作社获得的收益全部转化为集体公共积累继续投入产业发展，并未向集体成员分红。利益分配的延迟导致集体成员与集体产业发展之间的利益关联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相反，不断追加的集体投资还增加了村民对村集体扩大产业投入会挤占个体福利的担忧，乐瞳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个体本位与集体本位的张力凸显。延迟共享造成了村干部及村级党组织动员性质的变化。利益分配集体共享下村干部及村级党组织围绕文旅产业建设和运营，对村民的动员是一种公共性动员。但在延迟共享的局面下，村干部的双重身份使其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动员村民的难度加大。村庄内利益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分离造成村级党组织对群众的动员也陷入公共性不足的困境（杜鹏，2021）。

乐瞳村文旅产业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村庄治理场域。党建引领促进了文旅产业落地和运营，在文旅产业建设运营的过程中，乐瞳村形塑出“政社共建、有限共治、延迟共享”的治理格局，村庄公共性没有因产业建设而增长，相反，利益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分离还带来了村级党组织的公共性动员困境。在这一新的治理场域，矛盾与张力不断积累，最后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集中爆发。2017年底的村“两委”换届选举，竞选者原是村庄环境整治政策执行“一刀切”的利益受损者，他不仅许诺增加村民集体福利，还指责村干部“以公谋私”等，最终成功当选村主任，进而重构了村庄治理场域。在新的治理场域中，原先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被取代，文旅产业被强制剥离，村庄陷入维持状态，国家治理的各项资源也难以进入，村庄内部的公共活动快速减少，村民重回原子化状态。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陷入“低水平均衡”。

五、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与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能优化

（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治理共同体意涵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既是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集体”重建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能只瞄准集体经济增收这一目标而忽视治理过程本身，要建立健全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让村民的真实诉求得以表达，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村民与集体的关联不仅在于集体分红或公共服务供给本身，更重要的是，集体能够起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使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与自下而上的民情反馈能

够有效对接。发展集体经济关键是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共同生产活动，巩固和完善村民之间的社会性联结，建设基于个体性充分发展的共同体（潘璐，2023），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秩序。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构建治理共同体就是在坚持和加强村级党组织领导的前提下，把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政府等多元主体统一纳入治理体系，将村民自下而上的需求与集体资源、国家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投入结合起来，寻找彼此之间的利益结合点，畅通意见表达渠道，以协同共治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并保障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和共同享有。

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凸显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导向，这一过程强调建立村民与集体的关联。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并不是要替代农户发展，而是着力解决农户一家一户办不好、不好办和办起来不划算的事情。推动集体产业发展也并非简单汇集农村生产要素，而是重在构建统分结合的发展模式，只有将农户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构建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共同体，由此形塑包括村民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行动共同体，进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过程导向有助于跳出以集体经济增收为目标的单一思维，促进村级党组织审慎选择集体产业发展路径和发展规模，从而规避外部市场风险和村庄内部政治风险。

（二）治理共同体导向下党建引领的耦合调适

提升党建引领效能要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从增收取向到治理取向的逻辑转换。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就需要从侧重整合与动员作用的工具化党建中超脱出来，从工具理性回归价值理性，让集体经济发展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从村民的需求出发，推动村民之间的社会性联结，实现社会共治，建立既能发挥集体优势又能促进个体积极性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促进村庄团结和社会治理有效。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对权威、利益与价值进行耦合并在地化调整为与乡村社会相适应的共治策略（吴高辉和郝金彬，2022）。

1.权威的耦合调适。从基层党政部门到村级组织，从村级组织到普通村民，均同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治理场域，这一场域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叠加。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仅关涉经济系统本身的运作，更深受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当政治系统内的科层行政理性与乡村社会文化系统之间出现张力时，村庄集体产业发展的价值理性就会受到影响。由此，村级党组织在遵从自上而下的权威输入以及强化村级党建的同时也应找到权威落地的适应性空间，在充分吸纳乡村社会意见的基础上，争取党政体制内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交流反馈空间，在保证政策执行的同时促进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赋权。就集体产业本身，需要通过党组织体系内部的交流反馈，形成适应当地需求的集体产业发展模式和与村庄承载能力相匹配的集体产业发展规模。就村级党组织所在的治理场域而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交流反馈有助于政治系统良性运转，促进村级党组织更好统筹村庄内外部资源和平衡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实现多元主体共促集体产业发展。

2.利益的耦合调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要建立村民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联。这一利益关联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对集体资产资源的清产核资和折股量化。乐瞳村文旅产业发展早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村干部和村民对股份合作制的认知局限，乐瞳村发展集体经济并未确立资源折股和股权配置规则，故而集体产业发展是否能促进个体增收对村民来说是不确定的。利益

关联还表现在构建调动个体经营积极性和发挥集体优越性的运行机制。乐瞳村文旅产业由集体统一经营取代了农户分散经营，虽然在机制设计上，意图用集体统一经营保证建设和运营的标准统一，但也消耗了分散经营的积极性，带来了村级党组织的动员困境。提升村级党组织动员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需要密切村民与集体经济发展的利益关联，落实和规范股份合作制运作，发挥统分结合优势，以适宜的利益机制实现对“人”的组织动员和社会整合，形成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共治格局。

3.价值的耦合调适。落实集体收益共享是凝聚人心、增强集体经济发展认同、树立集体经济发展共识的重要路径。对于有一定集体收入的村庄，因追求长远发展而忽视利益共享在集体产业发展中是值得警惕的。提升收益共享水平需要在村级党组织领导下以村民自治的方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和确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规则，让不同生产要素获得合理激励。要充分承认村民经营劳动的价值和重要性，提升村社集体福利水平，平衡集体积累与个人分配的关系，从而增进村民对集体经济发展的价值认同。共建共治共享是参与感与获得感的统一，是村民价值认同的来源。只有村民产生价值认同，集体经济的发展目标和长远发展的理念才能被落实，发展主体才会持续在场，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重塑经营模式以建立增收长效机制；发展主体的持续在场、发展过程的可持续与共享成果的可持续相互作用，最终形成村民与村集体合作共生、协同发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生态（赵黎，2023）。

六、结论与启示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题。为实现农村人财物等生产要素的聚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普遍采用股份合作形式，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探索。股份合作的新探索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少受挫的案例，它们都属于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有力实践。乐瞳村的案例生动回答了党建何以引领、以何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呈现了增收导向下党建引领的效能困境。本文基于乐瞳村案例的历时性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可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根本驱动力，嵌入村庄治理的适应性党建激活了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形成了村级党建与村庄治理的正向循环，促进了村级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发挥和引领力的塑造，进而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村级党建通过“资源—主体—行动”的三维引领，以资源链接机制、主体整合机制和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现了发展项目落地和初步运营；这一发展过程形塑出“政社共建、有限共治、延迟共享”的治理格局，带来了后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停滞，从而折射出党建引领的实践张力。这一发展历程说明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实现从增收取向到治理取向的逻辑转换，需要基层党组织在权威、利益、价值层面耦合调适，以此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秩序，保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党建引领效能。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决定了党建引领需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从村庄发展和村民福祉的价值本位看，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终要回应村庄治理有效的问题。乐瞳村党建引领村庄发展的历程反映出应重视村民需求，并将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新农村建设阶段以民生工作为切入点做好集体经济创收，实现了村民与集体的双赢和村级党建与村庄治理的良性循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阶段，村民与集体的利益结合点更加聚焦于集体产业发展，获得村民认同是集体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尤其是村集体文旅产业发展涉及村庄空间的统一规划和改造，需要动员村民以土地、宅基地使用权入股合作社，一旦缺乏明确的利益分配方案，集体内部的合作就很难达成。在缺乏共识的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建引领的效能困境便会出现。由此，应进一步保障村民从集体经济中获取财产性收入，将推动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此外，集体经济内生式发展的动力还在于能够促进村民在乡村社会中实现劳动价值，发挥劳动的自主性，推动创新创造，形成发展的新动能。这就要求在发展集体产业的过程中做好统分结合，在村民持续参与的基础上，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发展模式 and 动态循环体系，有效提升党建引领效能。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学界关于党建引领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为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优化方案。但从历时性研究特点看，需要持续关注案例发展趋势，并与其他更丰富的案例实践形成对照，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拓展。

参考文献

- 1.陈义媛, 2020,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再组织化——以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 《求实》第6期, 第68-81页。
- 2.程熙、杨鸣宇, 2014: 《嵌入式治理: 中国模式“韧性”的机制来源》, 《领导科学》第23期, 第8-11页。
- 3.杜鹏, 2021: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集体经营机制: 类型与比较——基于村庄治理能力的视角》,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52-63页。
- 4.贺雪峰, 2019: 《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第185-192页。
- 5.胡柳娟, 2018: 《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若干思考》,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11期, 第48-54页。
- 6.黄宗智, 2019: 《国家—市场—社会: 中西国现代化路径的不同》, 《探索与争鸣》第11期, 第42-56页。
- 7.霍军亮、吴春梅, 2018: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1-8页。
- 8.景跃进, 2019: 《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 《探索与争鸣》第8期, 第85-100页。
- 9.李怀印, 2019: 《历史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论者商榷》, 《开放时代》第5期, 第53-62页。
- 10.李术峰, 2019: 《“政党统合型”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变迁为视角(1949—1956)》,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1.李永萍, 2020: 《基层党建、基层治理与村庄公共性——基于对佛山市南海区禾村党建创新的考察》,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第59-68页。
- 12.林尚立, 2001: 《领导与执政: 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6期, 第37-44页。
- 13.刘红凇, 2015: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困境与进路》, 《探索》第3期, 第19-24页。
- 14.马良灿、李净净, 2022: 《从利益联结到社会整合——乡村建设的烟台经验及其在地化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91-104页。

- 15.毛一敬、刘建平, 2021: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第131-140页。
- 16.潘璐, 2023: 《“集体”新议: 马克思公社思想的启示》, 《社会学研究》第5期, 第1-22页。
- 17.彭海红, 2014: 《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关系社会稳定和发展》, 《中国集体经济》第36期, 第3页。
- 18.石东伟、肖立辉, 2023: 《助推式耦合: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互促——基于C市Y区“党建联合体”的分析》,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第1期, 第32-42页。
- 19.田先红, 2020: 《政党如何引领社会? ——后单位时代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分析》, 《开放时代》第2期, 第118-144页。
- 20.汪俊玲, 2018: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 《红旗文稿》第15期, 第31-32页。
- 21.王长江, 2019: 《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年党建经验再思考》, 《党政研究》第4期, 第5-16页。
- 22.王浦劬、汤彬, 2020: 《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T市B区社区党组织治理经验的分析》, 《管理世界》第6期, 第106-119页。
- 23.王习明, 2005: 《农村税费改革和政治发展》, 《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第65-71页。
- 24.吴高辉、郝金彬, 2022: 《耦合调适: 乡村振兴中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理》, 《中国行政管理》第9期, 第97-107页。
- 25.吴欢欢、吕德文, 2023: 《复合型党建与村庄治理效能实践机制研究——基于豫北花村的个案考察》,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第59-69页。
- 26.谢忠文, 2015: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政党在场与嵌入路径——一项政党与社会关系调适的研究》,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第41-46页。
- 27.徐丙祥, 2018: 《新时代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思考》,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4期, 第25-32页。
- 28.徐勇, 2007: 《“政党下乡”: 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学术月刊》第8期, 第13-20页。
- 29.杨润峰、王一鸣、仝志辉、刘闯, 2023: 《基层党组织何以推进乡村建设——基于组织领导力视角的川底村党支部案例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第142-161页。
- 30.叶娟丽、曾红, 2022: 《乡村治理的集体再造——基于山东烟台X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80-90页。
- 31.殷, 2017: 《案例研究: 设计与方法》, 周海涛、史少杰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第1-5页。
- 32.原超、马华, 2023: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理论逻辑》,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第131-140页。
- 33.袁方成、杨灿, 2019: 《嵌入式整合: 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学海》第2期, 第59-65页。
- 34.张慧鹏, 2017: 《集体经济与精准扶贫: 兼论塘约道路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 第63-71页。
- 35.赵黎, 2023: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双案例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第60-83页。
- 36.郑琦, 2016: 《政党社会化: 当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第1期, 第40-45页。

37.周立、奚云霄、马荟、方平, 2021: 《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 ——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91-111页。

38.朱哲、姜广博, 2020: 《推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现实挑战及应对策略》, 《理论探讨》第3期, 第136-141页。

39.祝灵君, 2016: 《党建研究: 定位、框架与趋势》,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第2期, 第5-11页。

(作者单位: 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王 藻)

Practical Logic and Efficacy Optimization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 Diachronic Study on a Typical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GUAN Shan

Abstract: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 pivotal avenu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Yet,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to how party building takes the lead, its leading principles, and its overall effectiveness within the process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lacking. Based on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 case of Letuan Village in Zib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adaptive party building into the village governance process establishes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between village-level party building and village governance, boosts the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of village-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molds their leadership, and contributes intrinsic impetus to the village's shift toward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village-level party build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guiding and facilit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nitial operation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guidance of "resources - subject - action", which involves effective resource linkage, subject integ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This development process contributes to shape the governance patter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construction, limited co-governance, and deferred sharing",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the stag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later period, thus reflecting the practical tension led by party building. The case of Letuan Village illustrates the intricate practicalities associated with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in fostering the complementa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As a pioneering explo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necessitate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to adaptively synchronize across levels of authority, interests, and values, so as to construct a developmental order marked by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and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Keyword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tate and Society;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Sharing